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第三集 长篇小说卷1

主编 王 蒙

上海文艺出版社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1949—1976

In 20 volumes

VOLUME III: NOVELS—Part I

Editor-In-Chief: Weng Meng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Delin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

Shanghai, China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第三集 长篇小说卷一

主编 王 蒙 副主编 张德林

编辑：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行：（上海绍兴路74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上海中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8.75 插页 6 字数 798.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21-1459-7/I·1149

定价：43.00元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赵家璧 丁景唐

主 编 江曾培

副主编 郝铭鉴

编 委 左 泥 邢庆祥 江曾培

郑 隳 郑宗培* 郝铭鉴

(按姓氏笔画为序,*为本卷执行编委)

本卷责任编辑 郑 理

封 面 设 计 袁银昌

版 式 设 计 蒋福海

感 受 昨 天

——小说卷序



单是看一看一批小说的题名也会引起年长一点的人们的亲切怀旧感。《洼地上的战役》《风云初记》《三里湾》《红旗谱》《铁道游击队》《七根火柴》《月夜清歌》《红豆》《改选》《山那面人家》《羊舍一夕》《小巷深处》《在和平的日子里》《达吉和她的父亲》和《陶渊明写挽歌》……仅仅这些书名和篇名就够让人们回忆起多少往事，激发起多少情感，生发出多少思绪和嗟叹！

那真是一个凯歌行进，意气风发，人们自信得近乎天真，乐观得近乎沉醉，分明得近乎简单，崇高得近乎拔份的时代！那时候的小说创作也不愧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面貌一新的小说。常常都是有病无病地呻吟不止的“五·四”以来的新小说，似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浩荡的颂歌和国家春秋大典的伴奏铜管乐；常常是传达着迷茫、彷徨、无奈、两难的心绪的新小说与新小说家崇奉的洋经典，似乎在一夜之间，竟然变得篇篇心明眼亮，高瞻远瞩起来，天下风云尽收眼底，前五千年后五百年的事变，皆在掌握！什么时代的作家能这样八面威风！从前，小说里写的多半都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一点工农也是一副隔着老远吟咏之、感叹之、想象之、抒发之——借工农的衣衫哭自己的苍白的新老文人腔调的小说，也焕然一新地出现了工农大众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气息，自己的风貌……叫做新的

时代,新的生活,新的面貌,一个新字倾倒了多少作家,多少读者!人们指望着重欢呼着中国大地的焕然一新。而这个时候出现的文学的崭新花朵,即新的文学实绩,也是令人耳目一新,令人兴奋万端。它们不能不说是体现了以苏联文学为代表的世界进步文学的胜利与影响,体现了现代中国左翼文学(革命文学)运动的胜利与崭新发展,尤其是,它们宣告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中国革命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以来,中国的文学面貌正在发生着怎样巨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那时候人们对于文学对于小说的功能和品种,对于主题思想的正确与否与作者感情的健康与否的要求,对于首先从政治上评价一篇小说,态度是多么严格乃至干狭隘!《我们夫妇之间》写了工农干部的缺陷,不行,批!《关连长》写了解放军成员的幽默与情趣,不行,批!《洼地上的战役》写了志愿军战士的一种对于朝鲜女性的美好情愫,还远远谈不上是爱情,也不行,还是要大批而特批之!再联系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这种对于文学的严酷得近乎矫情的要求,这种棍棒飞舞帽子满天的局面谁知道吓回去了多少大有希望的文学新芽!献身革命至少是服膺革命欢呼雀跃的作家们,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胜利面前,头上出现了一抹又一抹乌云,人们隐隐感到了新中国的文学道路难免坎坷曲折,光明大路上却遍布着这样那样的几乎可以说是凶险的陷阱。

我说的首先是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现过三次小说创作的高潮,一个是建国初期,人们在新生活的鼓舞下写出了一片光明的清新强劲之作,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刘绍棠的《大青骡子》,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从维熙的《七月雨》等,它们反映了新中国的辉煌开篇,一派黄钟大吕的盛世强音与云淡风清的乐园气象,重读这些篇章,也许我们会感动于同时惊异于我们曾经是怎样地天真和轻信;而马克思是说过的,一切人类的弱点中,他最能够原谅的就是轻信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个美好的开端吧。

其次是在一九五六年前后,人们受到建国初期的种种新事物的激励,受到大时代的洗礼,又受到双百方针的鼓舞,一时间出现了许多脍

炙人口的佳作：《明镜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悬崖上》《改选》《红豆》《美丽》……等，这些作品在肯定着新生活的浪漫的诗意与新意识的道德的清洁的同时，开始探讨那么一点点新生活中也难以完全避免的矛盾与困扰。可惜，不久就因为政治运动的原因，使刚刚涌现出来的文学新生力量受到了惨重的打击，使小说对于生活的思考和追求受到了惨重的、应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而政治宣传上的种种浮夸、简单化、一厢情愿与千篇一律的缺陷，也同样地出现在小说创作的领域，降低着乃至污染着败坏着文学。一些作家紧紧追随这种宣传口径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作品，其题材内容甚至经不起三两年的时间的考验，（本大系舍弃大量的这一类作品，但也选了一两篇写得较有文采，当时起过轰动效应者，以使读者了解当时的小说全貌。）这是多么令人惋惜的啊。

与此同时，一批正在致力于鸿篇巨制的年长一些的作家在五十年代后期的政治风暴中安然无恙，正好在此后至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前后奉献出了一大批气势磅礴的长篇力作：《红旗谱》《青春之歌》《红日》《林海雪原》《红岩》《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主要是一些表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运动，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的史诗式作品。这是革命者胜利者的丰碑。这些作品充满了人民革命的苦大仇深的阶级激情，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把历史的舵盘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无坚不摧的胜利信念。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人们连肚子都吃不太饱的时刻，新华书店前也排起了购买《红岩》的长龙——时至今日，人们仍对那种盛况怀念不已。

而后，在一九六二年调整政策前后，又出现了一批更深沉精到之作：《李自成》（第一卷）《羊舍一夕》《长长的流水》《沙桂英》《前方》等。其后，由于政策环境的原因，小说创作愈益困难，百花凋零。但同时也出现了《路考》《出山》等勉为其难挖空心思的惨淡经营之作，或《开顶飞船的角色》等似乎更加符合教条主义的框架的所谓直接来自生活来自基层的速写式作品。而待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真正是一派万马齐喑，百花残败的严冬景象了。

“文革”中的作品我们只选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一篇,就是这一篇也没有逃脱被批判被攻击的命运,而且就是这仅有的一篇,也是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期间,经过毛主席的批示,文艺政策略有松动的情况下出现的。

从以上的相当概略和不全面的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创作与政策环境的关系。大矣哉,党的文艺政策也!

但是,这样讲马上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能不能把文学作品仅仅看做是政策的产物,政策的果实,把政策与小说的关系看做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呢?尤其是,更为重要的是,既然这一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并没有摆脱为政治服务的导向,甚至于应该说是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多是自觉自愿地为着革命的政治、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而服务的,那么能不能以对于那一个时期的政治斗争政治举措的检讨替代对于当时的小说创作实绩的艺术分析呢?

例如,海外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由于那时候的文学创作是为预设的政治目的服务的,由于那时的文学作品所传达的主题是预设的政治主张,由于那时的党的文艺政策确有这样那样的“左”的偏差,由于当时进行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所有或差不多所有作家都是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和党的文艺政策的,所以,那时的文学作品一无可取。

我们可以暂时不谈这种说法背后的分明的政治取向,因为人们不难看出这种说法本身也是太政治太露骨了。这种说法至少在方法上完全没有摆脱它所批评的以对于作品的政治倾向政治主题的分析决定取舍,以政治分析取代艺术分析的狭隘性简单性。这同样是一种视文学作品为宣传工具的短视,是一种非历史非艺术的跛足的小说评论:它们只不过是倒了一个个,那时人们认为不起劲地宣扬革命就不是有价值的文学,而到了今天,某些人又主张起不疏离或怀疑革命就不是文学了。文学史也和整个历史一样,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摇摆,识者慎之。

这里首先应该强调,五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的政治倾向与服务热情并不仅仅是政策规定更不是行政强制的结果。那时候,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对于党的政治国家的政治的热情与他们对于人生对于艺术的感

受是高度一致的。例如拙作《青春万岁》里充满对于人民革命胜利与新中国景象的讴歌,这种讴歌与对于青春对于爱情对于友谊对于首都北京的直觉的美好感受融为一体,与对于文学对于诗意对于艺术的憧憬融为一体,政治激情、艺术激情、人生的激情完全融为一体,这种交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幸运!即使新中国的历程,人生的历程并不像小说作者与书中的主人公所设想的那样美妙单纯也罢,即使事后看来那时的小说,不免稚嫩一点也罢,那种激情依然是可贵的与感人的呀。

其次,小说的作用和特质毕竟不仅仅在于传达一个主题思想,它更是一种审美的结晶与契机,谁能说这个年代的新中国人的生活里不是充满了美感和美的因素呢?谁能说我们的作家不是敏锐于生活中的美,生活中的诗意与激情呢?谁能说我们的那个时代的读者不是充满了对于真善美的渴求与拥抱呢?所有这些都是不可以轻易地加以抹杀的。

例如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十分真实动人地描写了一个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的知识分子,她的走上革命道路的曲折过程与心路历程。这部书甚至在日本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除了它的明确无误的政治内容以外,它同样也充满了人生真味。它是对于生存境遇、对于人生抉择、对于一种“活法”、对于一个女青年的心灵史的生动展现。它是历史,也是躁动着痛苦着却也希冀着的青春的诗篇。社会环境当然会变迁,发生革命的条件成熟性与必要性也会有所不同,但是青春之歌人人都是要唱一唱的,唱起来听起来,兀自十分动人。当然,各有各的酸甜苦辣,却也有心灵的共振与交流,有相互的启迪与借鉴。怎么能无视这种描写人们走向革命的 novels 的文学价值,而只承认例如对于苟安者卑贱者迷惘者的活法的反映或虚构呢?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情况较为复杂的《创业史》吧。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柳青真心实意地身体力行毛主席的指示,长期地全身心地下乡蹲点,与新的时代新的人物相结合,并且怀着改造封建落后贫困与四分五裂的旧中国的激情,投入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写出了力图反映这一伟大

历史进程的史诗:《创业史》。如今,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得失,人们的看法已经与柳青写书的那个时期有所不同。而重温柳青的书首的题词“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也使人们产生疑惑:“难道能够把劳动与创造财富分割开来么?”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读起这部书,也不能不为它的凝重的风格与深厚的内涵,为它传达出来的历史的严峻感,它的对于中国农民的挚爱与忧思,它对于中国农村中国土地的忠诚与眷恋,它的脚踏实地的坚实,它的掘地三尺的深入开挖,它的人物刻画的力量以及它在艺术上的惨淡经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力透纸背而感动,而叫绝,而发出会心的微笑与深长的叹息。如果柳青不是拘泥于既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方针,如果他更能大胆地反映生活的与历史的真实,他本来可以创作出怎样的伟大作品!

是的,一方面是某些客观环境与主观选择制约了作家的创作胆识与才华,一方面是作家的郑重、激情与才华突破着与生活真实不相一致的条条框框。而这里还有另一方面,第三个重要的方面,主观与客观的限制,恰恰成全了作者的深、重、苦、涩、严(严肃与严格乃至严厉)的不同凡响的风格。试想,如果柳青是天马行空,纵横挥洒,胜任愉快,得心应手地“玩文学”玩出来了一个“创业史”,如果这本书是狂欢地撒欢地写出来的,那还会是这种面貌吗?文章千古事,得失之间,又岂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呢?作家与环境的关系,又岂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呢?

这里作序者当然无意为当时的环境和政策不尽如人意曲为辩护,只是强调说,说到底艺术应该是艺术,艺术本身就是克服困难的产物,是挑战与挑战的回应,是即时的与现实的,却又是包含着某种对于永恒的追求即某种普遍性与超越性的因素的。环境与艺术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向的,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逆境摧残着艺术却也磨砺着艺术,顺境解放着艺术却也娇纵着艺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事业的光辉成就,我国明、清的小说成就特别是《金瓶梅》《红楼梦》《聊斋》的非凡成就,都并不是政治环境优良的产物。古往今来,文学史的事实一再证明,不能用于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好恶替代对于具体作品的

具体分析。

也许我们这里不能忽视的是孙犁的例子，与那些年出尽风头或者触尽霉头的作家与作品相比，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他是以边缘化的策略来做到既能自保又不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的。他具备自己的独有的政治智慧与艺术信心，他以一个罕见的高士与智者的姿态，当然也是以一个老革命作家的姿态经营自己的作品，从来不追风赶浪，从来没有大红大紫。他从来不去捋虎须弄龙尾，他只是不事声张地写自己的荷花淀的清新，写家乡人物的生动，写抗日战争这种较少争议的题材，写他心目中的柔和忠顺的诗。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孙犁是这个年代获得少有的成功的一位作家：许多年过去了，他的作品仍然栩栩如生，保持着远比旁人的应时之作更长久的生命力。他虽然难说是典范，做为一个特例，仍然使人们大受教益。当然，我们也无须回避，如果文化环境更好一些，也许孙犁会有更多更精彩更有分量的巨著留给我们。同时，在赞美孙犁的当儿，我们也不会贬低——也许更应该记住那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敢为天下先、敢于为时代立言为生民请命的另一种类型的作家与作品。

与孙犁相近，在困难的时刻默默地坚持着与众不同的艺术特别是手法与技巧的追求的，我们不能不提到的还有林斤澜，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一直颇有特色。

无疑，那一些年的小说创作确实受到了政治上与政策上的简单化、教条化的影响。对于社会生活的自然现成的胸有成竹的概括，先验的、不需论证就被认为是不可讨论的真理的结论，对于创作方法特别是现实主义的简单化理解（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在中国的排他性影响），对于文学的服务功能的理解的片面性，所有这些在人民革命大获全胜、新的社会体制刚刚建立的时期都是难以避免的或可以理解的，乃至是有它的积极性合理性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作家的思想的活跃与艺术的探寻，影响了这段时期的小说创作的更大实绩的出现。我国许多卓有成就的大作家，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正值盛年，他们对于新中国对于新的文学路线充满热情。然而，他们更熟悉的是

旧社会的生活特别是旧社会上、中层人士、知识分子或市民阶层的生活,要他们去写工农兵,去写革命队伍,去写几大改造几大革命运动,他们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终于,他们中的不少人解放以来并没有写出可以称道的新作来。这是他们个人的遗憾,更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一个损失。

再让我们以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为例。作者的另一部描写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暴风骤雨》曾获斯大林文学奖。但还是在《山乡巨变》中作者写得更加优美洒脱:湖南山村的风景画风俗画,都描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几个人物给人留下的是真实生动而不是符合阶级规定性的图解式的印象。尤其是作者运用湖南的方言非常成功,语言轻松、幽默、传神,读起来令人获得美的享受。对于这部作品是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深深地叹息,因为作者对于湖南山区的合作化运动的描写是必须符合当时的上级指示与文件精神,他对于合作化只能讴歌赞美,不能批评乃至不能怀疑探讨。他没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地的观察与作家的责任感全面地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他必须在下笔的时候有所取舍,有所美化包装,回避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一严峻的真实,把悲剧性的史诗写成顾左右而言他的轻歌剧。这样的批评的意思并不是要求作家在那时站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对立面,这样要求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现实的。其实如何判断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得失,对合作化运动作出评价,这并不是一个小说家的任务。一个政治的或社会的大事变本身也未必就能够成为小说的合适的题材,太大太严重的题材也许会撑破小说的躯体。这里说的只是让文学保持自己的文学性,让作家从紧跟照办的文件诠释中解放出来,让作家的生花妙笔运行得更加纵横潇洒,吞吐自如一些罢了。尽管历史的假设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是我们还是禁不住设想,如果那时候的小说家们的思想更解放一些,政策环境更开放一些,我们的文学园地将是怎样的另一幅繁花似锦的景象啊。

现在,我们不妨列举一些短篇小说作为探讨的对象。在我们国家,短篇小说常常成为文坛的晴雨表与风向标,成为文学事业的最热门的

话题，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报春的燕子，或者在情况严重的时刻令人知天下之秋至的第一片飘零落下的树叶。

丁玲的《粮秣主任》颇能体现去了解放区的老作家在实行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上的忠诚的、紧张的努力。与她相比，马烽的《三年早知道》等就写得顺风顺水得多，他更熟悉农村、农民，他把对于农民生活与个性的了解与描写，跟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政治教育的使命结合在一起，就是说他善于以党的要求做尺度，来概括与剪裁生活素材，并对于自己描绘的生活与人物作出鲜明的价值判断。至于那时刚刚冒出头来的一些文学新人的光明快乐之作，则轻巧地表现了他们的年轻的心对于新生活的感受与欣喜。现在读来人们可能觉得写得太浅，但当时它们像一阵清风一样地唤起了普遍的好感乃至陶醉，这也是事实。

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另一种清风，唤醒了不少小说家的内心激情与敏锐的目光。那时候引人注目的多数作家与作品，其实仍然保持着对于革命理想的憧憬，对于真善美的信念，对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追求，同时人们也面对人生中的一丝丝缺憾，事业中的一点不尽如人意，内心的一缕缕波动，有所咏叹，有所质疑——尽管这种咏叹和质疑其实还是相当肤浅的乃至于是幼稚的。同时，些许的对于文学更加开明的态度立即在作家的笔下开花结果，事隔多年阅读这些作品也会感到一种精神的自在与艺术的清新，小说写作的手法上，也显出了一点点变异和发展。终其极，不过如此罢了。但已经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或兴奋若狂，或如临大敌。即使没有后来的在劫难逃，仅仅当时的文学界内部的分歧，那种跃跃欲试的横扫的冲动与已经开始了的行为，也足以造成非良性的压力——令人慨叹，令人反思，难以忘怀。

一九六二年的又一波，则呈现出很不相同的风景。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写革命战争年代的同志真情，怀旧中流露出丝丝怅惘，焉知个中没有包含着对于政治运动毒化了的人际关系的不满，亦即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潜台词。汪曾祺的《羊舍一夕》、韦君宜的《月夜清歌》以及刘厚明的《山重山》……把连续几年的农村下放改造思想的经验诗化了。他们真诚地捧出了对于劳动者对于祖国山河大地的赞歌，生活的魅力与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与工农结合这一意识形态命题的魅力正是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信念和希望并不容易落实,但同时也并非轻易可以动摇乃至丧失。也许这一类作品所传达出来的一片痴情永远是动人的吧,即便以今天批评昨天以后一代批评上一代成了非常便宜的习惯性流行症也罢。

西戎的《赖大嫂》显示了那个时期的一个短暂的放松,那时候忽然说是可以“写中间人物”啦,于是赖大嫂应运而生,旋即受到了批评。能不能写中间人物居然成了一个敏感的大问题,这是后生者所无法理解的了。也许,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年代的赵树理的创作。他的《卖烟叶》与《锻炼锻炼》曾经被视为“写中间人物”的标本,恰恰是在这样的作品中,表达了“老赵”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忠实,表达了他的脚踏实地的农民代言人的质朴的本色。甚至在挖苦的行文中,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中国农民的熟知和热爱。欧阳山的《在软席车厢里》写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当时也算是空谷足音了,也反映了对于题材的取舍的短暂放宽。而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被指责为借古讽今,实也不足为奇,人们心中郁积的话实在是太多了。于是有影响广泛的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出现:从对于古人往事的追思与摹写当中透露出了今日的人们达观超脱中的无限悲怆与无奈。人性无法永久地扭曲,人情无法永久地禁绝,艺术也总会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寻求着自己的出路。六十年代的这一批作品因为其委婉蕴藉而有它独特的位置。其艺术成就绝对不在所谓“重放的鲜花”之下,可惜,受海外的另一种政治化的文学观的影响,人们对于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还少有足够的研究与评价。

当然也有些作品相对比较“安全”一些,例如王愿坚描写老红军生活的《党费》与《七根火柴》,把人放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来写,精练纯粹,令人肃然,革命人所经受的一切考验与他们在考验下迸发出来的光彩,都将永垂史册。而茹志鹃更擅长于写普通人的从细小走向大时代大世界的悲欢,虽然她也遭到了“家务事”“儿女情”的讥讽,但是在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猖獗的年代,她的委婉细腻娓娓动人的叙述风格仍然给了

当时的读者以难得的艺术享受，也就分外难能可贵了。

甚至到了“文革”前夕，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以及“文革”当中的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仍然是可以一读的作品。虽然它们身上的时代的疤痕是那样地刺眼，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不甘心使文学使小说全然变成标语口号图解、不甘心使小说都变得和《虹南作战史》或《朝霞》一样味同嚼蜡的苦苦努力。畸型的“文革”政治造成了畸型的小说，不甘心太畸型的小说又多多少少冲击着畸型的政治，最后连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见容，“左”到了登峰造极，也就离掀过这一页的时刻不远了。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记忆难于保持，以一种轻薄的态度抹杀前人的这一切，很方便也很廉价——其实只是证明了自己的无知。那样的历史，那样的小说，都绝非偶然，不了解昨天的人实难与之语今天。以为上一代人遭遇过的一切麻烦都已经很远很远了，是什么“死老虎”了，恐怕是孩子气的浅薄与一厢情愿。曾经困扰我们的类似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小说的主题思想的政治正确性问题、生活的本质真实问题、小说的价值标准……这些问题其实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甚至在今天的西方国家）都会长久地引发歧义——解决这些问题，在哪里也不会十分轻松。历史其实活在现实当中，历史其实常常重复至少是走弯路。不理解不体察历史的人民永远也不可能正确地判断现实，不论是怎样地夸夸其谈，其实是没有出息的表现。记忆实际是人类的一切思想情感文化文明的基础和根源，失去了记忆便只会走向信口开河，左摇右摆。隔代观火与隔岸观火一样，简易的感想与评论必然是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同样，简单地怀旧与慨叹今不如昔也许是同样的轻薄与廉价。想把历史的车轮拽住，想把下一代按入自己的模具复制冲压，也至少是狭隘与糊涂。一个是历史仍然活着，一个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个是不能任意抹杀历史，一个是不可以自己那一代人的经验与文学模式做为裁判今天的尺度，这样庶几可以更接近真理。

综观历时未久的昨天的代表性小说作品，也许我们能够获得某种教益。我们可以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知道珍重那些应该珍重的，鄙薄

那些真正应该鄙薄的。我们无需苛责前人,也无须为贤者长者避讳,往日的足迹还是弥足珍贵的。我们将温习历史,我们将取得与往事的某种相通,我们将保持记忆,保持一些对于历史的庄重的理解与在这个理解基础上必须解决的应有的超越——才能够去争取更好的明天。

此外,本大系收入了台湾与香港小说家的一些同期作品,作者多是近年来读者已经熟悉的一些名家,这大大增加了本大系的立体感与代表性。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文学的命运是一个整体,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的作家们的作品放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学画廊的全貌。他们的小说更多地让人想起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文学,他们的作品中的悲凉与寂寞恰恰与同期的祖国大陆作家的火热与通红互为映衬。历史是活着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历史又是整体的,像一个钱币一样,这一面的背面自然就是那一面的正面,“新人”的笑的另一面就是“旧人”的哭。当然,综观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设想那种完全不同却又相关相连的处境与心境,设想整个人类在这一时期的经验与试炼,回忆人们付出了怎样巨大的代价与为了获得一点长进克服了怎样巨大的困难,人们的喟叹人们的深思人们的心得将不限于此。

目 录

感受昨天	王 蒙 (1)
红旗谱	梁 斌 (1)
青春之歌	杨 沫 (423)

红 旗 谱

梁 斌